

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与国际经贸格局演变 动态关系的研究评述

赵 玲 张 玲 黄 玮

摘 要：大宗商品及其价格波动的研究始终是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各方围绕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定价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进一步引发了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因素”如何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机制以及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已成为具有深远意义且艰巨的课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介绍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成因及对经济的影响、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变迁及定价话语权的提高方式、大宗商品与经济安全的关系等，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揭示了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与国际经贸格局动态演变关系研究中可进一步探讨和突破的空间。

关键词：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国际经贸格局；动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6）03-0047-11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存在的重大挑战之一在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近年来，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先升后降、大幅震荡和错综复杂的变化，各方围绕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定价权展开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并进一步引发了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这种状况严重冲击着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创新动力的调整进程，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新常态”下的对外经济关系。因此，科学全面地分析中长期大宗商品价格演化趋势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国际经贸格局演变，从而在全新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下谨慎把握两者的规律性趋向，基于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地位形成中国参与全球大宗商品定价的战略安排，是一项极富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国内外大宗商品研究综述

以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贵金属为对象的大宗商品及其价格波动的研究始终是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话题。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195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商品贸易条件（净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即“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此后，国内外经济学界对大宗商品价格问题的研究争论不绝于耳。近年来，基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的事实，国内外研究大宗商品价格

作者简介：赵玲，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张玲，黄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演进与国际经贸格局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5ZDA058，首席专家：孙海鸣）。

的文献颇多,但研究大宗商品定价及定价权的文献较少,研究定价权变化与国际经贸格局互动关系的文献就更少。因此,本文将聚焦全球大宗商品和国际经贸格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对两者的动态演变关系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建议。

(一)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原因及其“中国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研究基本沿用了西方经济学市场均衡理论,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国际市场运行等角度展开了系列研究。

1. 供求方面。Yang等(2002)认为原油价格和OPEC产量存在负相关关系。IMF(2006)认为实际金属价格年变化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约为0.5。Kanplinsky(2006)指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生活标准提高速度远高于具有高商品收入需求弹性的发达国家,从而使得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Krugman(2008)、Hamilton(2009)、Kilian(2009)等认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初至金融危机前大宗商品市场繁荣的主要原因。Frankel(2008)认为低利率政策通过3种渠道降低了可储存商品的供给和需求。UNCTAD(2009)指出,2002~2008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部分可由基本的供求关系来解释。滕泰和羿伟强等(2006)、周海宝(2012)、韩立岩和尹力博(2012)认为,实体经济因素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长期动力。

2. 存货投资方面。郭明(2000)阐明了货币增长率的变动通过改变通货膨胀率预期导致存货投资的剧烈变动。张乐(2004)认为货币供给增长率波动通过投机性存货导致大宗商品名义价格大幅度的波动。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的研究结论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动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从而使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发生波动,进而改变投资者的存货需求,以此来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发生影响。

3. 货币因素方面。Frankel(1986)在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品价格的超调理论,认为由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具有黏性,货币政策冲击下商品价格的反应会比相应的比例高,并超出长期均衡点。随后,Saghaian等(2002)也证实了这一点。Browne和Cronin(2010)检验了商品价格、居民消费价格和货币的长期动态关系,认为三者之间关系稳定,在货币供给冲击下商品价格率先出现了超调现象。Chen等(2011)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大量国际游资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Tai等(2014)认为农产品期货政策的实施将先超调,再上涨达到新的均衡。

4. 全球流动性方面。Beckmann(2014)分析了大宗商品价格与全球流动性的短期时变动态,认为两者有双向因果关系。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的流动性对国内经济和资产价格的相关方面。张会清和王剑(2011)认为,全球流动性扩张的外部冲击一方面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中国间接施加了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程剑(2011)发现全球流动性对于4类不同品种的大宗商品(农产品、工业金属、黄金、原油)的影响是不同的。管清友和魏政(2011)

认为全球流动性是通过基础货币、利率、汇率以及投机性活动来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

5. 中国因素方面。王晓黎(2008)认为中国超预期政策扶持产业发展,收储、税收调节等将是商品价格新的影响因素。周世一(2007)认为中国的需求增长拉动了全球的需求增长。晏艳阳、李治和卢峰等(2009)认为中国总需求的波动会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具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

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因素不是各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主导因素,如韩立岩和尹力博(2012)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因素的作用是间接的,不是主要的。宋增基等(2009)的结论表明,尽管在中短期之内,“中国因素”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不太明显,但是长期来看,“中国因素”对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有着较大的影响。

(二) 大宗商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中国是多种国际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和需求方,长期而言其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的缺失,对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升级、国内物价稳定以及贸易条件都将造成持续的影响。

1. 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Hamilton(1983)分析了1948~1981年油价和美国产出的关系,确定了其他经济变量不能解释衰退,只有油价波动才能作为衰退的葛兰杰原因。Blanchard和Gali(2007)指出,油价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影响减弱的原因在于产出中更低的石油消费份额、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货币政策操作水平的提高。Collier和Goderis(2012)认为,短期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家的产出具有正向效应,长期影响程度将取决于大宗商品的类型以及政府管制程度。Estrades和Terra(2012)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乌拉圭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会被原油价格上涨部分抵消。

蔡慧和华仁海(2007)基于1998~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内存在商品期货指数到GDP指数的因果关系,其先行时间达2个月。林伯强和牟敦国(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具有紧缩作用,但对不同产业的紧缩程度不一致,能源价格除了影响经济增长,还将推动产业结构变化。李卓和李林强(2011)认为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中国CPI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并不显著,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并没有受其影响而改变。蔡宏波和王俊海(2012)研究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PPI的影响较为显著,相比较而言,对CPI的影响较弱。刘凌和方艳(2014)发现国际油价与实际GDP、未预期的货币政策与实际GDP的动态相关性均为正。

2. 对经济结构影响方面。Makin(2014)认为,商品价格上涨将使得GDP构成发生变化,而不是GDP的水平。Knop和Vespignani(2014)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将影响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和制造业,金融和保险部门将获益。干杏娣和刘凌(2010)证明国际油价冲击对中国出口存在正向传导效应,现有的石油定价机制有

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近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走低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货紧缩,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同时,它也可能造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不利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3. 对物价影响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如 Kilian (2007)、Bloch (2007) 和 Bhattacharya (2006) 等。Furlong 和 Ingenito (1996) 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确实存在联系并随时间变化。林淑华 (2012) 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物价指数的影响要比其对美国物价指数的影响慢且弱。苏明和陆军 (2009) 论证了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领先工业企业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一期,领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两期。

关于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的影响的文献多以实证为主,如 Leblanc 和 Chin (2004), Blanchard 和 Gali (2007), 魏一鸣 (2008), Wu 和 Ni (2011) 等。Chen (2009) 认为,油价冲击的影响正在降低,油价的传导效应可以用国内货币的升值、较积极的抗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较高等度的贸易开放来解释。Kormilitsina (2011) 认为,美国货币政策放大了油价冲击的负面影响,对油价冲击的最优反应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和利率。

关于农产品价格冲击对通胀的影响方面。张树忠等 (2006) 发现中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 CPI 具有先行指示作用。严宝玉和余剑 (2008) 分别以原油、铁矿石、农产品为例的研究发现,三类初级产品价格变化在影响国内价格水平的传导效应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程国强等 (2008) 认为不同品种农产品之间的价格波动存在传导性和同步性,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王立清等 (2010) 以石油、小麦和大豆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政府管制程度下,三者的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

4. 对贸易条件影响方面。张小瑜和白明 (2008) 认为国内外价差导致企业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贸易活动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突出,进出口贸易流向倒转,影响了国内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乔宝华和黄坤 (2010) 的研究结果表明:(1) 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承前启后,是整个传导链的核心因素;(2) 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都非常显著。陈长缕 (2009)、胡丹和李洪梅 (2011) 均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运行使得中国贸易条件恶化。

(三) 对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和定价权的研究

一些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进行了分析。建立良好的市场交易机制是争取定价权的重要举措,一个国家要把国际定价权发展成为一项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工程。

1. 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方面。在石油市场的定价机制研究上,张建新 (2006) 论证了二战后美国霸权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李纪建和管清友 (2007) 分析了石油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属性,认为石油价格涨跌都是在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下实现的,以利益分配为基准在一定区间内上下浮动。欧阳旭和舒先林 (2010) 认识到石油定价

领域的金融属性与政治属性相结合的特点。熊爱宗（2012）认为建立一个国际化、具有较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成为一个经济体影响大宗商品定价的关键。

2. 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董方军和王军（2008）侧重分析了中国大宗商品缺乏定价权的原因：一是由于缺乏国际定价中心；二是由于行业集中度低导致无序竞争；三是由于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病，对国内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制过严；四是由于期货市场发育不完全。黄河等（2013）认为大宗商品定价机制背后不仅是利润之争，更是定价权之争，而这种定价权实际上是以安全因素、生产结构、金融和知识为源泉的结构性权力的产物。

3. 金融在大宗商品定价中的影响力研究方面。Krippner（2005）认为，“金融化”是指各类经济主体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取利润的积累模式。Domanski（2007）认为，金融机构涌入商品期货市场的现象称为商品期货市场的“金融化”。Greely 和 Jeffrey（2008）发现投机头寸与商品价格正相关，指数投资与商品价格几乎不相关。Akram（2008）发现利率和美元共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变动。Tang 和 Xiong（2010）研究发现，大宗商品金融化使得供求关系不再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唯一因素，金融资产的风险偏好以及商品指数投资者多样化的投资行为成为商品价格波动的决定因素。史晨昱（2011）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化带动下，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不仅仅是现货的供求关系所能决定的，其更多地是反映金融商品的特点。张雪莹等（2012）认为，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特征，其主要原因包括商品指数交易者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等。李援亚（2012）认为，在农产品领域，尤其是粮食与石油、矿产资源等其他大宗商品一样越来越具有金融化的趋势。唐衍伟等（2001）认为，期货市场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起核心作用。刘庆富等（2008）针对期货交易中存在的非同步性，对中国铜期货信息联结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朱宝琛（2011）认为，为了能够分享到期货市场带来的红利，改变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定价的局面，中国亟需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期货市场，不断增加新的期货品种，争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

（四）大宗商品与经济安全的研究

随着大宗商品的进口量明显攀升，中国不能主导大宗商品定价的主动权，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利益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关于大宗商品与经济安全的研究主要以研究大宗商品的战略为主。吴巧生和王华（2002）认为，中国能源问题的关键是实施石油安全战略。倪建民等（2005）提出了对外开辟海外能源渠道与对内节能并举、实行能源战略储备、以洁净技术和替代能源开发为重点调整能源结构的政策建议。汪云甲（2002）提出了矿产资源安全

研究的基本原则及亟需加强领域。仰炬等（2008）认为，政府管制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及波动性有着重要影响。林伯强和杜立民（2010）的敏感性分析显示，石油中断规模和石油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对最优储备规模有较大影响。结合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进行风险分析的代表性成果是吴振信和王书平（2012），他们以国际石油、铜铝两类大宗商品为例，解释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主要影响变量与金融风险生成的机理。

从最广义范围、最综合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从市场、理论和战略3个层次对大宗商品价格及其影响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孙海鸣等发表的《中国战略性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14~2015）》。该《报告》从大宗商品与宏观经济、国家安全、金融市场、贸易管制措施、气候治理的多重关系进行理论剖析，进而探讨了中国的大宗商品全球战略与政策选择、交易平台建设与服务功能拓展、融资策略等战略对策问题。

（五）关于国际经贸格局的研究

中国是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之一，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将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复杂的影响；反之，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也影响着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1. 国际经济格局方面。陈文玲和颜少君（2012）、陈继勇等（2012）与金芳（2010）认为，国际经济格局包括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以及这些经济体经济规模的增速。同时，陈文玲等（2010）还认为，经济格局的变化还应反映在增长方式的变化上。

2. 国际生产格局方面。金芳（2010）认为，国际生产格局的变化也说明了全球供应链区位导向的变化，可用主要特定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增加值及增长率来说明国际生产格局。

3. 国际贸易格局方面。金芳（2010）和陈继勇等（2012）认为，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反映在世界贸易总额的变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世界占比和贸易额增速等变量上。陈银飞（2011）认为，国际贸易格局可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量以及贸易总量的分布情况来表示，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世界贸易，从而描述整个世界贸易的格局。汪建新和黄鹏（2011）指出，在结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总体为正的情形下，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才能体现出正的生产率效应。孙楚仁和赵瑞丽（2013）发现进出口产品价格上升时都会致使劳动力工资上涨。

4. 国际金融格局方面。陈继勇等（2012）认为，国际金融投资格局方面的变化首先要分析货币和外汇储备格局发生的变化，其次是金融实力的变化。朱民（2010）认为，国际金融格局反映在1,00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债券余额、金融衍生品的名义价值以及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上。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陈继勇等（2012）、金芳（2010）、朱民和鄂志寰（2000）认为，国际金融格局反映在世界外汇交易额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和流出的规模和增减幅度上。

5. 国际经济治理格局方面。陈继勇等（2012）和金芳（2010）认为，国际经济治理格局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治理机制的变化上，包括新的经济组织的出现及经济体世界地位上的变化，这也体现了经济、贸易、金融投资格局的变化。

（六）关于研究方法方面

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日益增强，大宗商品定价、定价工具乃至价格波动与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品交易、资本市场及货币市场之间的交叉影响日益密切。特别是围绕着定价和结算货币问题，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博弈十分复杂。相应地，其研究方法也有一些新的突破。

1. 关于 FAVAR 实证模型方面。为了解决现实中变量过多问题，Bernanke 等（2004）将因子分析和标准的 VAR 模型相结合，提出了因素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引入不可观测因子 F_t 后，FAVAR 模型能全面捕捉现实中的经济信息，更加真实地反映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实证分析效果更优越。Consoletto 等（2009）系统地叙述了这种方法与 DSGE 结合有较好的预测效果。

2. 关于 DCC-MVGARCH 实证模型方面。为克服无法捕捉各变量间的时变性的相关关系的缺陷，一些学者提出了用多变量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MVGARCH）模型来研究多个资产或者多个市场间的相关性。Engle（2001）认为金融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一种动态条件相关关系（DCC），并构建了一种 DCC-MVGARCH 模型来估计变量的时变的方差矩阵。该模型分两步：先估计每个资产的单变量 GARCH 模型，再通过该模型残差变形估计条件相关关系。Cappiello 等（2006）则在 DCC 模型基础上构建了 ADCC-MVGARCH 模型，发现股票和债券收益率的条件相关关系受负面冲击的影响比正面冲击大，而股票收益率条件波动的非对称性比债券收益率更加明显。Billio 等（2006）构建的 FDCC-MVGARCH 模型放松了 Engle（2001）在 DCC-MVGARCH 模型中对所有资产共有动态相关的假设，假设不同类资产间存在着不同动态关系，将分块对角结构运用到 DCC 模型。后两者是对 Engle（2002）的拓展，在非对称性和动态相关假设方面做了改进。

3.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为真实还原和科学描述大国和区域之间围绕大宗商品定价展开的激烈博弈，魏巍贤和林伯强（2007）分析了国内外石油价格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能源消费大国内部市场变化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唐永红（1999）、胡昭玲（2002）和王珏（2005）等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经典的“保护待售”应用于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与国际经贸格局的分析，演化出战略性环境政策、国际垄断联盟、国际货币关系、国际政经格局等不同的分析维度，刻画了大宗商品定价与国际经贸格局之间的复杂互动联系。

二、对已有相关代表性成果及观点的分析评价

从以上文献及其观点来看，近年来关于“中国因素”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研究最为丰富。而且，在这两个方面，关于“中国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机制以

及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仍然是一个意义深远且复杂的课题。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现有的研究偏向于价格波动的现象描述,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和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未能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进行规律性的总结

从现有文献看,除少数文献提及和运用简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进行大宗商品定价机理分析外,大多数研究均停留在表面化的供求关系现象描述;少部分文献研究了在现有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及货币体系下大宗商品价格形成的机理;还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大国价格联盟的存在及其财富掠夺性质。但是,这些研究都未能将纷繁复杂的变量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形成有效驾驭大宗商品价格分析的理论研究逻辑体系,因而难以达到总结归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之内在规律的目标要求,尤其无法系统、有效地解释最近20年来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基本原因及其未来趋势。

(二) 现有文献缺少对大宗商品定价权问题的微观机制分析

第一,目前多数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分析,且这些文献大多停留在定性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层次上,未能对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微观成分进行解构与集成分析;第二,以往的研究过于静态,研究者主要关注了中国定价权的缺失、衍生品市场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而没有辨证地看到中国衍生品市场在逐步完善,在定价权的争取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尤其缺乏对二者关系的动态演变观察及其走势分析判断;第三,以往的研究过于片面,有的成果尽管涉及微观层面却失之偏颇,如单纯以“投资者心理”为据未免有唯心或宿命之嫌;第四,大宗商品定价权与中国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之间的联系也鲜有涉及。此外,在研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经济影响时,已有文献的视角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对物价或通胀产生的宏观影响而较少涉及其微观层次作用的机理,对国际收支、就业和经济增长所包含的微观层面的作用机制也鲜有涉及。

(三) 现有文献缺乏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国际经贸格局演变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

众所周知,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国际经贸格局演变息息相关,它既是国际经贸格局演变的直接结果,同时也对国际经贸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已有的文献中,只有少数成果涉及对传统国际经济关系格局的分析。但是,现有文献存在共同的不足:其一,它们都缺乏对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双边自贸区格局演绎导致的经济“碎片化”下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的分析;其二,它们都缺乏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关系下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新格局中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的分析;其三,它们都缺乏对科技革命、新能源、新材料发明日益加快和环境保护、全球气候治理不断成熟条件下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的分析;其四,它们都缺乏对金融危机后全球经贸、金融格局与全球治理关系变化的

过程中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的分析;最后,它们在研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时,普遍缺乏对国际政治热点变幻、军事与宗教文化冲突频发、国际反恐与安全合作等事务的必要关注。

(四) 现有文献与中国“新常态”经济、“新开放”格局及“新战略”取向的联系不紧密

以全球性金融危机为阶段划分界限,中国经济经历了大国崛起与进入“新常态”的复杂变化,中国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和努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提出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出并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与自贸区战略,加快与周边及沿路、沿带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牵头组建金砖银行、亚投行等金融支持体系等。国内经济稳定与国际地位上升,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以往学界的研究对这一最新的动态和趋势估计不足、跟踪有限,因而其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也显得极为不够。

(五) 现有文献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过于简单且存在一定的偏颇

在现有的研究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或其定价权问题的文献中,除了理论上的明显缺陷外,普遍存在方法论过于简单或不科学的问题。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多数立足于静态的、定性的现象分析与逻辑判断,少数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只是应用了简单的统计分析(如OLS、VAR模型等),或仅限于对单个大宗商品进行局部均衡的分析;也有一些成果试图运用较为复杂的计量方法或金融工程手段进行研究,但基本上都存在单一或考虑的变量不足等问题。因此,得到的研究结论要么过于简单直观,要么相互矛盾,有些偏颇和偏差、甚至于错误。

三、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大宗商品定价与国际经贸格局演变的动态关系,应将研究立足于克服已有文献的诸多不足,采用辨证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基础构建、科学方法运用、战略政策拟定和实际对策设计上争取尽可能新的、有效的突破。本文认为至少存在以下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

(一) 理论建设有待于完善和创新

已有的文献缺乏对大宗商品价格分析的理论框架,偏重于简单的现象描述与统计验证,即使少数成果运用到一些理论,也停留于一般的理论概念,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利益集团博弈模型、长波理论的周期思想,并且显得支离破碎。事实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建立多学科的、统一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理论界需要完成理论基础的再造、完善和创新。

(二) 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过往的研究在理论与现象观察上视角较为单一,主要偏重于从供求关系、货币

关系两个方面展开分析。这就难免使得最终研究停留在国际流通层面,解释的也仅仅是一般的物价变动传导过程与要素成本—福利关系。我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问题在宏观上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网络、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与货币关系等均有深刻的联系;在微观上与产业及企业的技术进步、互联网应用与生产流程再造、企业三元边际(集约、扩展与价格质量)等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更是息息相关。所以,理论与实践观察的视角有待于拓宽。

(三) 研究的架构需要进一步梳理和丰富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国际经济格局演变”主题下,理论基础再造和研究视角的拓宽必然带来研究架构的调整。在错综复杂的机理变化分析中,需要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进和科学细致的逻辑推论;需要在基础模型之上,充分考虑和研究各种外部冲击变量带来的影响;在纯经济因素之外,还要结合国际政治、安全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事务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干扰。所以,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架构需要进一步梳理和丰富。

(四) 研究的方法也要加强和创新

鉴于以往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偏于定性、传统和简单,理论研究需要创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第一,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必须打破静态研究,运用动态研究的结果修正和完善已有的结论;第二,运用CGE模型分析多种大宗商品、多元利益主体、多重影响变量之间的综合的一般均衡关系,克服单种商品、单一主体和单一变量下局部均衡分析的偏误;第三,建立主模型和子模型组成的模型群,运用WIOD/MIOD、马尔科夫链等方法研究全球、多国之间投入产出关系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模拟多元政经关系相互作用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效果;第四,以SCP模型为逻辑依据,研究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对大宗商品市场结构、主体(包括政府与企业)行为及其绩效的正向与反向影响;最后,运用DSGE方法对中国在国际经济新格局下大宗商品定价战略、政策的效果进行模拟与纠偏。

参考文献:

- [1] Browne, F. and Cronin, D. Commodity Prices, Money and Infl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10, 62(4).
- [2] Chen, Shiu-Sheng. Oil Price Pass-Through into Inflation[J]. Energy Economics, 2009, (31).
- [3] Consolo, A., et al. On the Statistical Identification of DSGE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9, 150 (1).
- [4] Domanski, Dietrich, et al. Financial Investors and Commodity Markets[J]. BIS Quarterly Review, 2007,(3).
- [5] Frankel, J., et 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 Commodity-based Economy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8, 16(4).
- [6] Greely, David, et al. Speculators, Index Investors, and Commodity Prices[J]. Goldman Sachs Commodities Research, 2008, (6).

- [7] Kormilitsina, Anna. Oil Price Shocks and the Optimality of Monetary Policy[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1,(14).
- [8] Tai, M. Y., et al. Monetary Policy and Price Dynamics in a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4, 29(1).
- [9] Tang, K., Xiong, Wei, et al. Index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ies[J]. NBER Working Papers, 2010, No. 16385.
- [10] 蔡宏波, 王俊海.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中国经济波动: 基于不同来源油价冲击的经验考察[J]. 经济学研究, 2012, (1).
- [11] 陈继勇等. 后危机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的战略应对[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 (12).
- [12] 陈文玲, 颜少君.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结构的构建[J]. 宏观经济研究, 2012, (3).
- [13] 韩立岩, 尹力博. 投机行为还是实际需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因素的广义视角分析[J]. 经济研究, 2012, (12).
- [14] 金芳.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 2010, (10).
- [15] 林伯强, 杜立民.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最优规模[J]. 世界经济, 2010, (8).
- [16] 林伯强, 王锋. 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9, (12).
- [17] 乔宝华, 黄坤. 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对中国贸易条件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J]. 世界经济研究, 2010, (8).
- [18] 孙海鸣等. 中国战略性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14~2015)[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
- [19] 仰炬等. 我国粮食市场政府管制有效性: 基于小麦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 (8).

A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Commodity Pricing Mech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Pattern

ZHAO Ling ZHANG Ling HUANG Yi

Abstract: The study on commodity products and price fluctuations are alway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recent years,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experienced complicated changes. Countries launched a fierce struggle around the commodity, especially the pricing of energy, and that further lead to the profound adjustment of the pattern of global economy. How the “China factor” affected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 and how to improve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ing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focu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origin of commodity price fluctuation and relative impact on economy, the changes of commodity pricing mechanism and the ways of improving pricing pow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dities and economic security. It points out the inadequacies of existing research, then puts forward further discussions and the possible breakthrough space for the dynamic 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 words: commodities; pricing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pattern; dynamic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张建华)